

全民族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学院创办的历史解析

王海凤, 余子侠, 韩亚楠

摘要: 全民族抗战时期, 为解决大后方基础教育严重的“师荒”问题,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重建高等师范教育体系, 为此先后创立11所国立师范学院。这些学院或独立设置, 或由各高校教育系或教育学院改设, 或由有关高校教育系合设。它们在组建方面实现了有限的办学资源共享; 由于分设各地, 在布局方面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师范教育网络; 各师范学院除设置常规的本科各学系外, 还附设第二部、初级部、进修班及研究所等, 构建了完整的师范教育支撑体系。这些高师教育机构的创办, 不仅在战时为基础教育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师资, 还在学制系统中补充和完善了师范教育体系, 为战后的教育复兴和发展准备了教师。

关键词: 全民族抗战; 国立师范学院; 学制建设; 师范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 G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660(2025)03-0043-10

七七事变后, 寇骑所至, 庐舍为墟, “日寇深知欲贯彻侵略我国计划, 须从教育入手, 欲改造教育须从训练师资入手”^①, 遂对沦陷区的师范教育进行大肆摧残破坏。斯时, 受20世纪20年代“高师改大”运动的冲击, 高等师范学校数量骤减, 中等学校的师资, 多由综合性大学各系毕业生充任, 导致中等学校教员水平的低下, 与其时中等学校急需专业师资的矛盾愈加激烈。^②为解决“师荒”问题, 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创办国立师范学院。^③这一举措使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事业在停滞近15年后再次恢复, 并逐步形成了自身发展体系。在抗战史与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中, 既往针对国立师范学院的研究成果呈现两种主要路径: 或从制度层面入手, 剖析师范学院制度的运行逻辑与内在机理; 或聚焦某一所特定的国立师院, 探究其独特的办学实况。其中, 将国立师范学院视为一个群体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 相对匮乏。截至目前, 仅有硕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学院的设立及其历史评析》对此进行了系统探索。有鉴于此, 本文旨在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 在全面梳理11所国立师范学院创办历程的基础上, 深入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6年度项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的应变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6BZS066)。

作者简介: 王海凤,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开封 475004); 余子侠,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韩亚楠,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开封 475004)。

① 李蒸:《敌人摧残后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通讯》第1卷第11期,1938年。

② 郑西谷:《中学师资训练问题之研究》,《教育杂志》第26卷第7号,1936年。

③ 本文所讲的“国立师范学院”, 不仅是指战时设于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 而且指包括这所国立师范学院在内的所有“国立”的师范学院。

分析其办学特色及历史意义，为推动新时代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历史借鉴。

一、国立师范学院的创办过程

20世纪20年代，受“高师改大”运动的冲击，我国高等师范教育机构急剧萎缩，导致“中学师资端赖各大学供给”^①。这些为师从教之人，在缺乏教育专门师范教育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不断试错的方式积累教学经验，往往需要耗费较多时间去摸索教学技巧，“所学非所用，自感痛苦”^②。如在最需要教育专业背景的中等师范学校，师资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受过专业训练者，不过占百分之二十强，而未受专业训练者，反占百分之八十。”^③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全国教育事业跌入谷底，在中等学校教育体系中，缺乏专业教育训练的教师占据了极大的比重。斯时，“师荒”已成为普遍而严重的问题，“良师救国”的呼声日渐高涨，教育界人士对重振高师教育的愿望亦更为迫切。^④他们的激切呼吁，逐渐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回应，最终促成全面抗战时期重建高师教育制度举措的落实。

1938年4月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着重强调“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培养中学教师。^⑤根据该纲要的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全国师范教育设施“多漫无规划”，以致“师资之培养与任用，每不能联系沟通，而供求亦不能适合，亟须加以矫正”为由，于同年5月要求各省依据《确定师范教育设施方案》，于当年划定师范区，“每区至少设师范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一所”。^⑥7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设立师范学院”^⑦。于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8年8月10日以第4378号部令正式公布《师范学院规程》，该规程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师范学院的国立性质^⑧，既显示出当局对高等师范教育的重视，也便于由国家出面对原有教育院系进行重组或合并。至此，国立师范学院的筹建工作开始全面展开。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设立6所国立师范学院的决定。^⑨其中5所师范学院，分别设于国立西南联大、国立西北联大、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以及国立浙江大学；另外一所，在湖南境内择址筹设。在增设的6所国立师范学院中，国立师范学院（亦简称“蓝田国师”）于年冬最先筹设，“树师院单独设置的先声”。该校校址奉部令须设在湖南，且靠湘黔或湘桂两干线。原选择在湘黔路上的溆浦，正值武汉、广州先后失守，长沙又遭大火，湖南局势震荡不安，“嗣因交通不甚方便，治安亦成问题”^⑩，故改设安化县的蓝田镇^⑪。至于其他5

① 江苏省县私立中等学校校长会议特辑：《请求教育部恢复高等师范学校培养中学师资案》，《江苏教育》1940年第4期。

② 陆殿扬：《中学英语科师资训练》，《教育杂志》第25卷第7期，1935年。

③ 孙邦正：《改进我国师范教育刍议》，《教育通讯》第4卷第31期，1941年。

④ 余子侠、冉春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322页。

⑤ 《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教育通讯》1938年第4期。

⑥ 《教育部指示各省规定师范教育设施方案要点》，《教育通讯》1938年第9期。

⑦ 陈立夫著：《战时教育方针》，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77页。

⑧ 《师范学院规程》，《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8期，1938年。

⑨ 《教育部变更大学教育院系之组织：特设独立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教育学院改名师范、私立大学教育学院取消》，《申报》1938年10月10日。

⑩ 廖世承：《各师范学院院务报告：国立师范学院》，《教育通讯》1938年第34期。

⑪ 吴景贤：《一年来的国立师范学院》，《教育通讯》第2卷第25期，1939年。

所国立师范学院，起初均附设于综合大学内。为便利国立大学筹设师范学院，教育部制定《国立中央大学等校设立师范学院办法》。在接到部令后，5所大学随即组织筹备委员会，至1938年年底，5所国立师范学院全部建成。

6所国立师范学院建成后，成效日益显现，各界人士要求增设师范学院的呼声不断。鉴于“后方中等师范人材极感缺乏”^①，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全面抗战中后期陆续创办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国立湖北师范学院5所国立师范学院。5所师范学院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动议较早。早在《师范学院规程》订定时，即于第二条明确规定“得筹设女子师范学院”^②。及至1940年3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458次会议议决通过《筹设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案》^③。该校校址原定四川綦江（今重庆市綦江区）某地，时因其地已勘作铁路的路基，后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今属重庆）觅定校址修筑校舍。同年9月，该校正式成立^④。这所为了“改进女子教育及增进中等女子教育效率”^⑤“使有志从事教育之女子得受高级师范之专业训练”^⑥而设立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全国“唯一的女子最高学府”^⑦。该校建成后，另外4所国立师范学院也相继成立。笔者现将全面抗战时期创办的11所国立师范学院的基本情况梳理出来（见表1）。

表1 全面抗战时期11所国立师范学院一览

校名	成立时间	初定校址	院长	校址变迁情况
国立师范学院	1938年11月	湖南蓝田	廖世承	1944年5月迁溆浦， 战后迁至衡阳
国立中央大学 师范学院	1938年年底	重庆柏溪	艾伟 后由许本震、徐养秋接任	战后随本校回迁南京
国立中山大学 师范学院	1938年年底	广东罗定	崔载阳	后迁徙云南澄江、广东坪石等地，战后随本校回迁广州
国立浙江大学 师范学院	1938年年底	广西宜山	郑宗海	后迁贵州遵义、湄潭，1941年10月在浙江龙泉设分院，战后随本校回迁杭州
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师范学院	1938年年底	云南昆明	黄钰生，1940年前后曾断续由许桢阳、查良钊、陈雪屏先后代理	后在四川叙永设分院， 战后留昆明
国立西北联合 大学师范学院	1938年年底	陕西城固	李蒸，后由黎锦熙接任	1939年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1年于兰州设分院，1944年整体迁往兰州。战后一部回迁北平改办国立北平师范学院

①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十月间可开学》，《大公报》（桂林）1941年7月27日。

② 《师范学院规程》，《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8期，1938年。

③ 《行政院决议筹设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申报》1940年3月27日。

④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近况：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杂志》第22卷第8期，1945年。

⑤⑥ 《教育部筹设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通讯》第3卷第16期，1940年。

⑦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大竹旅渝同学会会刊》，1948年第1期。

续表

校名	成立时间	初定校址	院长	校址变迁情况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1940年9月	四川江津	谢循初	留渝续办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	1941年10月	贵州贵阳	王克仁, 后由齐泮林接任	迁往遵义, 战后回迁贵阳
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	1941年8月	四川峨嵋	黄建中	战后随本校回迁成都
国立桂林师范学院	1943年8月	广西桂林	曾作忠	后转迁三江、贵州榕江、平越, 战后迁往南宁
国立湖北师范学院	1944年春	湖北恩施	陈友松	战后迁往湖北江陵

资料来源：余子侠、冉春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第327—328页；《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近况·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学生杂志》第22卷第8期，1945年；《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概况》，《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7卷第2、3期合刊，1944年。

注：既往前期研究成果中，余子侠与冉春在其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研究》第327页，以及冉春的硕士论文《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学院的设立及其历史评析》第15页中，均列示了上表相关内容。然而，受限于当时所能见的史料，关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二校的成立时间记载存在偏差，今依据新史料进行更正。

二、国立师范学院的办理特色

全面抗战时期，随着国立师范教育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增添，国立师范学院无论在学院组建层面，还是设置布局层面和教学组织层面，均形成了独特的办学模式。

（一）学院组建层面：实现了有限的办学资源共享

根据《师范学院规程》，师范学院可以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为此，全面抗战时期创办的11所国立师范学院，就学院组建层面而言，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一是独立设置，二是由原各高校教育系或教育学院改设，三是由相关高校教育系合设。

国立师范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是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学院。上文对前两者的创办过程已有所述，在此不赘述。广西大学改为国立后，广西省政府即决定以余款筹办省立师范学院。^①全面抗战中后期，面对小学毕业生渴望升入中学的人数与日俱增，而中学师资却“无专所训练”的实际情况，该省政府特向教育部提出设立“国立广西师范学院”的请求。^②其后，广西省政府决定撤销“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与“广西教育研究所”^③，合并改设广西省立师范学院^④。1942年4月1日，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院正

^① 《桂省筹办师范学院》，《大公报》（香港）1939年9月21日。

^② 《桂省呈请创办国立师范学院》，《大公报》（香港）1941年11月21日。

^③ 《桂省筹设师范学院，省务会议昨决定》，《大公报》（桂林）1942年2月26日。

^④ 《桂设师范学院》，《新泰日报》1942年3月2日。

式成立。^①为“符合师范学院应由中央统筹办理之规定”^②，该校在1943年之前正式更名为国立桂林师范学院。^③至于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则由原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恢复改组而来。^④1941年春，为“发展教育、解决师荒问题”，湖北省政府于恩施筹设教育学院，是年10月1日，“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恢复上课。^⑤1943年12月7日，在李四光等一众知名人士的积极推动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将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改组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⑥1944年1月，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正式改称“国立湖北师范学院”。

就那些由原各高校教育系或教育学院改制而成的师范学院而言，有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及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现以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的创办历程作为典型案例展开论述。在《师范学院规程》颁布后，四川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曾拟定筹设师范学院的计划，因迁校影响以及经费未经拨发而一直未能付诸实际。至1940年秋，四川大学请求拨发经费“增设师范学院”的提案才得到教育部批准。^⑦1941年8月，四川大学师范学院于峨眉鞠漕正式成立。^⑧其余三校，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以浙江大学教育系为基础改设而成，学院各系主任由浙江大学文理各系主任兼任^⑨；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以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为基础改设而成；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则由中山大学教育系及教育研究所合改而成^⑩。

进一步审视由各相关高校教育系整合而成的师范学院，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立西北联大师范学院以及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皆赫然在列。现以国立西北联大师范学院为例，以窥探其发展脉络。七七事变爆发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为避战火，历经波折迁至西安，并于当年8月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彼时，原居天津之河北省立女师亦随之并入。^⑪翌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再迁汉中，改组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该校教育学院正是由河北省立女师与原北平师范大学合组而成。是年岁末，扩建为师范学院。1939年8月，教育部将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更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⑫其余二校，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由西南联大教育系与云南大学教育系合设而成^⑬；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则借用原贵阳师范学校的部分教室和场地，与其时已迁往贵阳的私立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合设而成^⑭。

^①《桂林师范学院今日成立》，《大公报》（桂林）1942年4月1日。

^②《教育文化消息》，《国民教育指导月刊》第2卷第1期，1943年。

^③《桂省师范学院将改为国立》，《中央日报·扫荡报》1942年12月11日。

^④1931年春成立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在1936年7月停办，其原址设湖北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湖北省政府西迁后，该农业专科学校亦迁至恩施。1941年秋，湖北省教育厅将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改组扩充为农学院，校址移至金子壠。

^⑤陈友松：《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成立以来之经过及检讨》，《新湖北季刊》第3卷第1、2期合刊，1943年。

^⑥《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改组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中央日报》（重庆）1943年12月8日。

^⑦《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概况》，《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17卷第2、3期合刊，1944年。

^⑧院长室：《师范学院概况》，《国立四川大学校刊》第20卷第2、3期合刊，1947年。

^⑨《各师范学院院务报告》，《教育通讯》第1卷第34期，1938年。

^⑩《国立中山大学近讯》，《教育通讯》第2卷第11期，1939年。

^⑪《河北省立女师学院通告》，《中央日报》（重庆）1937年11月4日。

^⑫李蒸：《发刊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39年第1期。

^⑬《各师范学院院务报告》，《教育通讯》第1卷第34期，1938年。

^⑭《本院概况》，《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特刊》，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委员会1948年编印。

综观战时11所国立师范学院的组建历程可以发现，它们均以综合性大学为依托，或由原各高校教育系或教育学院改设，或由各有关高校教育系联合设置。这种创办方式在战时教育资源极度紧张的情势下，无疑实现了有限资源的共享。此种资源共享模式的涵盖范围并非局限于图书、实验设备、教室、校舍等物质层面的资源，还延伸至师资队伍、管理机构等核心主体要素。通过这种资源共享有效地缓解了战时高校办学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紧缺的困难，为高校在特殊时期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设置布局层面：形成了合理的师范教育网络

1938年5月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确定师范教育设施方案》在拟具计划时，为完善师范教育布局，满足区域师资培养需求，要求于当年即刻划定师范教育区，明确规定每个区至少设立一所师范学校或者乡村师范学校，“各区不能单独设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应于师范学校内设立女子师范部”^①。同年7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要求根据全国各省市的实际，在全国范围内划分若干区域，“设立师范学院”^②。此外，《师范学院规程》亦作出明确要求，各师范学院应积极协助划定区域的教育行政机关，针对该区域内的中等教育开展研究工作，并提供专业的辅导支持。有学者将全面抗战时期11所国立师范学院的辅导区域进行梳理总结：国立师范学院主要辅导江西、湖南，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的辅导区域是四川、重庆、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西部及西藏东部）、湖北，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辅导区域有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要辅导其所在地云南，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的辅导区域是广东、福建，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的辅导区域在广西、贵州。^③

1940年，“为增进中等教育效率起见”，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师范学院辅导中等教育办法》^④，此后，各国立大学的师范学院和独立师范学院开始分区实施中等教育辅导工作，师范区制度开始成型。实际上，设立国立高等师范院校并划分辅导区域，能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中等教育师资的培养。可以说，师范区像一座桥梁，加强了师范学院与地方中小学教育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它能够为地方基础教育，尤其为师资培养提供切实有效的辅导与支持；另一方面，能使师范学院的教学成果在教育实践中得到及时检验，从而精准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进而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改进。是故，师范区的建立，构建起了一个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的师范教育网络。

（三）教学组织层面：构建了完整的师范教育支撑体系

国立师范学院成立后，在教学组织层面，除设本科各学系外，还设有第二部、初级部、进修班及研究所等，建构了完整的师范教育支撑体系。

从横向来看，首先，国立师范学院在设有本科各学系的同时，设立了第二部、初级部。就

① 《教育部指示各省规定师范教育设施方案要点》，《教育通讯》1938年第9期。

② 陈立夫著：《战时教育方针》，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77页。

③ 冉春：《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学院的设立及其历史评析》，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40页。

④ 《师范学院辅导中等教育办法》，《中等教育季刊》第1卷第1期，1941年。

前者而言,《师范学院规程》以明确条文规定,师范学院“得设第二部”^①,招收大学其他学院性质相同学系的毕业生,开展一年专业训练,期满且考试合格,经教育部复核后,由所在院校授予毕业证书,同时由教育部颁发中等学校教员资格证明书。1939年,为满足教育发展需求,教育部着手规划在各师范学院增设第二部的相关事宜,并于1940年公布《各师范学院第二部二十九年度招生办法》,令饬各院提早准备。^②可见第二部的开设目的在于为中等学校培养优良师资,并为师范学院以外的毕业生进入教师行列提供了门径。就后者而论,为培养“初级中学及简易师范学校(科)之师资,以适应各省需要”^③起见,教育部于1941年8月颁布《设置师范学院初级部办法》,令师范学院加设“初级部”,面向高中、中师毕业生招生。此外,亦会录取同等学力且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满一年的保送生(这类学生入学条件与保送资格同第二部相仿,但程度稍低,须经过复试)。这些学生入校后,需要接受为期三年的学科及专业训练,待训练期满,考试成绩合格,并经教育部复核确认后,方可获得毕业证书以及教师资格证书。初级部的设置则为高中、中师毕业生提供了接受师范教育的机会。在培养新鲜血液的同时,国立师范学院还开设有提升高级中学、初级中学、小学三级教员教学水平的“进修班”,对中小学原有教师进行培训,并为其发放教员检定合格证书。^④

就纵向来说,依据《师范学院规程》的明确规定,国立师范学院专门设立了“师范研究所”,为那些师范学院毕业生,以及大学其他院系毕业且有两年以上教学经验的中等学校教员,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研究所的研究期限为两年,期满后,若通过硕士学位考试,学生即可被授予教育硕士学位。^⑤1939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设立了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行政及教材教法四个研究部^⑥,国立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均开设了与教育学、心理学有关的研究部。^⑦师范学院研究所的应时而生,标志着师范学院实现了从单一教学功能向教学与研究并重的转型。它不仅肩负着培育中等学校师资之重任,还担负着研究教育科学之使命,成为引领教育发展的最高权威机关。

三、国立师范学院创办的意义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努力重建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为此创办的11所师范学院,不仅在战时挽救了高等师范教育的颓势,从学制建构上完善了师范教育体系,而且在战后促进了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战时意义:解决了基础教育存续和发展亟需的师资

“国师”二字,即“国家的师资”之简称。作为“未来中学教员的孕育所”^⑧,战时国立

^①《师范学院规程》,《教育部公报》第10卷第8期,1938年。

^②《各师范学院二部招生及升学办法》,《申报》1940年1月24日。

^③李友芝、李春年、葛嘉训编:《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第2册(内部资料),1983年编印,第437页。

^④《修正师范学校规程》,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室编:《教育法令》,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85页。

^⑤罗廷光编:《师范教育》,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2页。

^⑥《院务概况》,《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39年第1期。

^⑦《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近况》,《教育通讯》第4卷第38、39期合刊;1941年;《国立各大学扩充研究所》,《申报》,1939-09-27。

^⑧金戈:《国立师范学院剪影》,《湖南青年》第1卷第9期,1940年。

师范学院的创办，培养了一大批优质的中等学校师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后方的“师荒”问题，保障了基础教育的存续和发展。

一方面，国立师范学院的创办直接培养了大批优秀毕业生，成为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师资的重要来源。例如，全民族抗战时期，仅设于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就培养出3839名师范生^①。诚如时人所赞：“蓝田种玉，古所著名，秦楚异地，事有同情；师资培养，众志成城，复兴事业，乐观厥成。”^②至于开办于教育素为贫瘠之区的国立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更是将优质的师范教育覆盖了广袤的西北大地。

另一方面，国立师范学院附设有“中等学校教员进修班”^③，面向中等学校既有教师开展在职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基础教育师资的整体质量。例如，国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成立后，就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滇省中等学校在职教员进修班”^④，招收学员近百人。一些学员毕业后成长为中学校长、骨干教师或省、县教育行政部门的骨干。以云南省立会泽初中为例，1939年新聘教师中，“三分之二均为西南联大毕业生”^⑤。对此，教育界人士曾有如下赞誉：“师范学院在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史上，是比较最完善的制度，对于目前以及将来中等学校师资恐慌的救济和师资品质的改进，无疑的是负着重大的使命。”^⑥

（二）学制建构：在学制系统中补充和完善了师范教育体系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教育界有识之士强烈呼吁重振高等师范教育，这一呼声逐渐在舆论与决策层面占据主导地位。关于师范教育问题，学者一致认为，中学师资问题亟待解决，而其根本出路无疑在于恢复并大力改进师范教育制度。诚如杜佐周所言，中国师资训练所暴露出的种种不良现象的原因在于缺乏完整的师范教育制度，“中学教学的成绩之不如昔日，乃非无故的，故若今后要求师范教育制度的完整，必须恢复高等师范的设置”^⑦。

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系始于癸卯学制。该学制规定由国家统一设立初级师范学堂与优级师范学堂。斯时，在教育体系中，优级师范学堂的地位明显低于分科大学的本科层次，甚至相较于高等实业学堂也处于劣势。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颁行之后，高等师范学校虽被定位在大学本科与专科之间，然其地位尚未臻于理想之境。1922年新学制颁布之后，与综合大学相比较，高等师范学校的地位依旧处于较低水平。受其时“高师改大”运动的冲击，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萧条，仅存北京（平）师范大学一校仍保留高师的独立形态。^⑧自后中等学校师资来源，主要渠道有二：一是通过教育院系培养，二是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在师资培养规模等方面的比例严重失衡。在此情形下，中小学教育领域

① 《国立师范学院历年学生人数统计表》，《国立师范学院旬刊》1948年第128期。

② 顾树森：《祝词》，《国师季刊》1939年第1期。

③ 《师范学院附设中等学校教员进修班办法》，《教育部公报》第16卷第2期，1944年。

④ 《滇省举办中等学校教员进修班》，《教育通讯》第2卷第44、45期合刊，1939年。

⑤ 郭莲峰、宗亮东：《川滇黔交界教育掠影》，《教育通讯》第2卷第44、45期合刊，1939年。

⑥ 滕大春：《师范学院修业年限的商榷》，《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2期，1942年。

⑦ 杜佐周：《师资训练的必要性及其几个重要问题的检讨》，《教育杂志》第25卷第7号，1935年。

⑧ 其时与北京（平）师范大学并存的还有北京（平）女子师范大学。几经周折拆并，至1931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即女师大变体）合组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因此，全民族抗战爆发时，国立高等师范教育机构仅此一校。

陷入了“师荒”困境，大量未经系统教育教学训练的人员充斥于教师队伍之中。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30年，中学师资队伍中受过正规师范教育训练者仅占15.81%；不具备相应任教资格却在岗执教者，比例高达31.99%。^①其核心症结在于，在师资培育方面，师范院校与综合大学犹如两列背道而驰的列车，各自为营，缺乏协同合作，导致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仿若一座无形的孤城，自成藩篱，将自身困于封闭之境。

《师范学院规程》颁布后，在院校地位上，师范学院取得与文、理、农、医学院同等的地位。全面抗战时期创办的11所国立师范学院，不仅设有本科各系，还设有第二部、初级部、专修科、职业师资科、师范研究所等部类。此外，师范学院还附设高级中学、初级中学以及小学教员进修班。特别是“第二部”的设立，面向大学其他学院中性质相同学系的本科毕业生进行招生，此举不仅避免了学科知识的重复讲授，还能集中精力对其开展教育理论与教学技能的专项培训，从而赋予高等师范教育更强的包容性与兼融性。由此可见，全面抗战时期的国立师范学院，在教师培养方面，涵盖了高、初、小三级教师，涉及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在职培训等多个领域。横向而言，各领域之间相互关联，纵向来看，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发展态势。至此，11所国立师范学院已成为功能完备、结构严谨的综合性师资培养机构，实现了从独立封闭向开放多元的转变，有效补充并完善了师范教育体系。

（三）历史影响：为战后民族教育复兴和发展准备了大批教师

全面抗战时期，以培养师资为本职工作的11所国立师范学院，就学校的主体而言，在战后无论是回迁原沦陷区，还是留在西部继续办理，均延续了教师教育的传统，为战后民族教育复兴和发展准备了大批良师。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当下部分知名师范大学溯本求源，仍不难发现这批国立师范学院的余脉延续。

先看全面抗战前期创办的6所国立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设于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并入湖南大学，1953年再度划出，并以此为基础成立湖南师范学院，为今日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更名南京大学师范学院，于1952年与金陵大学师范学院合并独办为南京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1951年，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被正式撤销，其与私立华南联合大学教育系一同并入广东省文理学院，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华南师范学院，后续该学院更名为华南师范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随校回迁后，各系归并至文学院、理学院，其余脉几经变迁，由今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及浙江师范学院（大学）可寻其根绪。至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抗战胜利后，为培养西南各省中等教育师资起见，教育部决定将其在昆明独立设置，改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②，即今日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国立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在战时即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于战后永设兰州，成为今日的西北师范大学。

再看全面抗战中后期创办的5所国立师范学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于1946年迁往重庆，后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师范相关系科合并，组建为西南师范学院，即今日西南大学的前身之一。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几经辗转，于1985年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考虑到“桂林已设有国立广西大学，为谋桂南教育文化发展”，令该

^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 丁编》，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26页。

^② 《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学系核定》，《教育通讯》（复刊）第2卷第3期，1946年。

校迁往南宁，经行政院核准，改名国立南宁师范学院。^①1950年2月，该校自南宁启程回迁至桂林，随后再度并入广西大学，在此基础上组建成立广西大学师范学院，后续更名为“文教学院”。该院几经调改更易，其学脉为今日广西师范大学之根。国立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在战后逐步发展为今日四川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在战后迁抵江陵。^②1948年5月，学院迁回武汉。新中国成立后，其学校主体及基业，或归并于今日的华中师范大学，或演变为现在的湖北第二师范学院。要言之，战时为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依循学制而先后开办的11所国立师范学院，直至今日，其后身几乎仍在作为教师的摇篮，承担着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任。它们的存续发展为民族教育的复兴和发展不断输送一批批良师。

综合而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筹设一批国立师范学院，既是适应战时特殊环境的一项重大应变措施，又是重振高等师范教育的一件重大教育创举。诞生于抗战烽火之际的11所国立师范学院，在极为艰难的战争环境中，毅然肩负起培育战时亟需中等教育师资的重要职责，成为战时支撑和拯救民族教育事业的关键力量。况且，战时国立师范学院为适应时局而作出的调整，尤其是第二部、初级部、职业师资科、进修班等的设立，已突破了仅服务于培养中学师资的职能局限，在整个教育领域中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正是这批国立师范学院的开设和办理，使全面抗战时期我国基础教育事业能够及时补充师资而未致中辍。

(责任编辑：汤浩泽)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Higher Normal College During the Period of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ng Haifeng, Yu Zixia, Han Yan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serious shortage of teachers of basic education in the rear area,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ecided to rebuild higher normal education system, and 11 national higher normal colleges were established. These colleges were either set up independently or reformed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s or schools of education of colleges, or jointly set up by relevant education departments, realizing the sharing of limit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Due to the different locations, the colleges formed a reasonable network of normal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regular undergraduate department, the colleges also had second department, primary department, advanced class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nstructing complete support system for normal edu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colleges solved the urgent need of teachers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during the war and improved normal education system in school system, preparing teachers for the rejuve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fter the war.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otal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national normal college; school system construction; history of normal education

^①《桂林师范学院改名》，《教育通讯》（复刊）第3卷第5期，1947年。

^②《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在江陵建筑新校舍》，《新闻报》1946年8月5日。